

## 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初探

万振凡<sup>1</sup>，李雪<sup>2</sup>

(1.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九江学院 政法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摘要:**《斗争》是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创办的机关报,作者主要来自苏区高层领导干部,它在根据地建立了一个多渠道的发行网络,但只限在根据地内部发行,其发行对象主要是苏区各级党组织及其成员。《斗争》主要刊载党的文献和苏区领导人撰写的指导苏区工作的论文,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理论性刊物。《斗争》刊登过许多有积极影响的文章,对苏区革命起到了正确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但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左”的理论和政策,对革命和苏区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关键词:**《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6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4-0032-06

### *Struggle –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Central Bureau in Chinese Soviet Areas*

WAN Zhenfan<sup>1</sup> , LI Xue<sup>2</sup>

(1.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2. Department of Marxism – Leninism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5 ,China)

**Abstract:** *Struggle* was an official newspaper founded by the central bureau in Chinese Soviet areas in February 1933. Its authors mainly came from top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Soviet areas. It established a multi-channel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but the issuing was only limited in internal base areas and mainly for the Soviet part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and its members. It mainly published the party's literature and papers guiding Soviet Area work written by Soviet area leaders, and was a typical political theoretical publication. Relatively speaking, *Struggle* was more remarkable in publicizing the “left” theory and policy than other publications, but also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with a positive impact, and played a guiding role promoting the Soviet revolution.

**Key words:** *Struggle*; official newspaper; historical function

《斗争》创刊于1933年2月,是苏区中央局创办的指导苏区革命斗争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当时,它和《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一起,被誉为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四大红色报刊。目前,史学界关于《红色中华》报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而对于《斗争》的专题研究,则是空白。本文拟从报刊史的角度,对《斗争》作初步探讨。

### 一、《斗争》创办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从井冈山开始的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1931年1月15

收稿日期:2012-06-08

作者简介:万振凡(1963-),男,江西余干人,博导,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

李雪(1972-),女,江西九江人,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黄陂正式成立,是为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并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革命斗争。1933年11月,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与此同时,全国党员人数由1927年7月的1万人发展到1934年长征前的30万人。<sup>[1](P685)]</sup>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内教育和党的建设任务日益迫切。正如1933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中所指出“党员数量上是增大了许多,但党内教育则异常缺乏”,造成“一般党员政治水平极低弱的严重状况”。为此中央局提出“必须采取各种必须的方法,使每个党员对于党和党的基本主张有初步的认识”,各级党组织“必须讨论中央和中央局的文件”,“启发党员发表意见,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观点与倾向”。《决议》强调中央局必须“经常供给关于党内教育的各种材料”,发挥“党报的实际作用”。<sup>[2](P18-19)]</sup>正是这种背景下,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应运而生。

1933年2月4日出版的《斗争》第1期刊登的《党报委员会的通知》,为我们揭示了当时苏区中央局创办《斗争》的直接原因。这则通知指出“过去苏区党中央曾经出版《实话》与《党的建设》两种刊物,但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方面还有很多缺点,且又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现在中央局决定把这两种刊物并为一种,改名为《斗争》,在内容方面亦力求改良,希望全党同志给与这一刊物以各种帮助。”由此可见,《斗争》的创办直接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局原来出版过《实话》和《党的建设》两种刊物,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期出版,只是临时性刊物,不能适应当时苏区斗争需要。二是《实话》和《党的建设》这两种刊物综合性、理论性不强,在内容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能真正起到党刊的指导作用。因此,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等到达瑞金后,将原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与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办的《党的建设》合并改名为《斗争》,直接由张闻天任书记的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希望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将它办成苏区中央局党的权威性、综合性、理论性刊物,以真正发挥党报对苏区革命的指导作用。

《斗争》创刊之际,正是苏区革命斗争艰苦之时。一方面,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斗争进入了白热化时期;另一方面,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占据了统治地位,对苏区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斗争》就是在这种“内外斗争”的环境中创办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时代背景对《斗争》的创办和发展不能不产生影响。

## 二、《斗争》的作者来源、读者群及发行渠道

《斗争》为16开本的旬刊、铅印,重要文章用4号宋体字。1933年8月第22期改为周刊。1934年9月30号出版第73期后停刊。一般每期16页,有时20页,最多的是第24期共计32页,最少的一期也有12页。该刊在一般情况下基本上都能按时出版,即使是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紧张的时期,仍然在坚持出版。《斗争》从创刊到停刊,共出刊73期,发表文章356篇,其中以个人名义署名的作者共有49人,文章共181篇,不少文章是分期连载的。这49人大致可分为以下6类:

1. 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在《斗争》上发表署名文章的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成员有:洛甫、博古、陈云、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顾作霖等。其中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的张闻天发表的署名文章为最多,共计27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罗迈,发表署名文章也有17篇之多。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在《斗争》上发表署名文章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也很多,主要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部部长吴亮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查委员会副主任董必武等等。

3. 红军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及时地解决根据地武装斗争所面临的问题,指导苏区的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红军各级领导干部也积极投稿《斗争》。如: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邓发等都经常在《斗争》上发文。

4. 根据地的省级领导干部。根据地各省省级领导、尤其是省委书记是《斗争》重要的作者群体之一。如湘鄂赣省委书记的陈寿昌,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等先后都在《斗争》上发表过文章。

5. 团中央的领导干部。在《斗争》中,我们经常看到“凯丰”的署名文章,共计10篇。凯丰当时任团中央书记、宣传部长之职,年龄才二十七、八岁,是《斗争》来稿较多的团的领导干部。

6. 其他。在《斗争》中还有一些使用佚名或笔名发表的文章,如:阳春、杖人、石心、滴人等,可能是笔名,无法查明其身份,故其来源也无所归纳。

总的来看,《斗争》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其作者主要来自于中央苏区各类机关的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苏区高层领导经常为《斗争》杂志提供重要稿件,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斗争》第2期刊登的《党报启示》指出“党报希望省委、县委、区委、各支部及全体党员”不仅要经常阅读《斗争》,还要“经常写文章做通讯,收集材料,来供给党报,同党报建立经常的关系”。<sup>[3]</sup>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斗争》的发行对象主要是苏区各类各级党组织,其读者群主要是苏区各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另外,共青团组织、少先队及其他群众性团体也经常订阅《斗争》。如许多乡和区苏维埃政府要求,少先队各大队“应组织读报室管理委员会,经管一切购报读报事项。管理委员会要每5天或7天召集全体队员来读《青年实话》、《斗争》、《红色中华》”。<sup>[4] (P164)</sup>据有关史料,《斗争》每期发行数在2.7万份以上,是苏区一份有广泛影响的刊物。<sup>[5] (P309)</sup>

根据苏区中央局规定,《斗争》只限在根据地内发行。在根据地,《斗争》建立了一个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共存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发行体系。

《革命》在党委发行方面,主要由中央局发行部承担。中央局发行部是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在1933年4、5月间,将原来中央出版局管理的发行部划归苏区中央局领导后改组成立的发行单位,它负责向各级党委系统发行《斗争》。

《革命》在政府发行方面,主要由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发行科承担。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1932年4月成立于瑞金沙洲坝,隶属于临时中央政府,它既是一种发行机构,又是苏区书报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科则是苏区中央发行系统的延伸,它负责向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发行《斗争》。

《革命》在军队发行方面,主要由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承担。它成立于1933年5、6月间,简称“总政治部发行科”,它负责向军队系统各级党组织发行《斗争》。

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化部门创办了不少的图书经销部门,如:红色书店、《青年实话》书店等,也会零星出售《斗争》。另外,根据地的邮政系统也是《斗争》发行的重要渠道。

### 三、《斗争》文章类别和内容

从《斗争》发表的356篇文章的编目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马恩列斯理论文章、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从共产国际等杂志上转载过来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理论教育,《斗争》经常刊载理论文章,供党员干部学习讨论,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如第68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远东战争与共产主义的任务》、恩格斯的《波斯与中国》,介绍的是马列主义关于中国革命有关理论;第55期《关于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的通知》,则是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对中共的指示;第70期《群众创造的历史》,是从苏联《真理报》上转载过来的社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第22、23期上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第66期刊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领袖》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了中共为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的理由。这类文章共有20篇,它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素材,有利于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2. 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重要决议、指示和宣言,这类文章一般在文尾署发文机关名。作为党报,《斗争》与苏区其他报纸不同,它担负着传递党的政治主张,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使命,是苏区党和政府传达、推行政令的重要工具。如《斗争》第2期发表的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第9期《中央局关于五一劳动节的决定》,第13期《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宣言》,第16期《中央告全党同志和一切劳苦大众书》,第18期《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第80期的《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指示信》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文章共有60篇,它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对各项工作的具体方针和政策,直接指导、推动根据地各个方面的工作。

3. 社论类文章。社论是《斗争》编辑部就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其功能是通过社论传播,引导苏区人民对苏区重大问题的认识趋向一致,形成意志的合力,并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上统一行动,最终达成党的政治目的。如《斗争》第62期社论《前进!向着扩红突击的伟大胜利》,社论对扩红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对江西和福建在扩红运动中的落后现象进行严厉的批评;社论提出了在扩红运动中,必须做到的五条要求和措施;社论最后强调一定要在“五六七月完成和超过五万新战士”的任务。第68期社论《争取敌人高举进攻面前的秋收胜利》,社论分析了这次秋收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武装保护秋收,是放在我们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社论号召“苏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武装起来,一切党和政府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一切武装,都要全体动员起来,为着秋收而斗争”。《斗争》共刊载社论8篇,它集中反映并传播苏区中央局对当时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对社会舆论发生重大的影响,对苏区革命实践具有高度的指导作用。

4. 有关党内路线斗争和党的建设的文章。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因此,这方面大部分文章的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左”的。如《斗争》第3期洛甫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第8期洛甫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第9期亮平的《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甯化党的工作》;第12期罗迈的《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第68、69期石心的《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为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等,体现了“左”倾路线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原则,给当时苏区党的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但也应当指出,《斗争》也发表了一些对苏区党的建设有积极作用的文章。如罗迈的《健全支部生活的几个中心问题》,在《斗争》第9期和第13期连载;第27期李富春的《江西党目前的几个中心问题》等等,对苏区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与方法。

5. 关于反“围剿”战争和军队建设的文章。由于当时苏区处于反“围剿”战争时期,军事斗争是主要任务,因此,苏区的军事斗争成为《斗争》关注的一个重点。如《斗争》第7期刊载的邓颖超《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第19期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第24期周恩来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第28期王稼祥的《为保持红军中思想上的绝对一致而斗争》;第40期刊载的《列宁论游击战争》;第59期刘伯承的《现代游击战争要解答的问题》等等。其中周恩来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向全军提出了扩大和巩固红军,加强与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七项任务,对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 关于根据地经济、文化、政权建设的调查报告和文章。为了指导根据地各项建设的顺利开展,苏区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斗争》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根据地建设的文章。如《斗争》第9期洛甫的《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和《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第44期亮平的《怎样使苏维埃成为更有力的动员群众的政权机关》等,分别对苏区的基层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作了论述。此类文章在分析现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对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基本政策和主张,以指导根据地经济、文化、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

7. 关于领导方式和方法的文章。《斗争》不仅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任务和政策,而且还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实现任务、执行政策的具体领导方式和方法。如《斗争》第2、5、20、28连续刊载的洛甫《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文,不仅揭露了各种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表现和危害,而且还针对苏区各级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提出了依靠群众、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方法。第18期陈云的《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文,则通过典型事例,说明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依靠群众”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另外《斗争》第2期杨尚昆的《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第18期亮平《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第34期亮平《合作社怎样工作》;第45期列宁《怎样组织竞赛?》等等,则分别提出了某一方面具体的领导方式和方法。苏区时期,我党刚刚开始执政,执政能力还有待提高,《斗争》刊载的这些文章,对提高党员干部的领导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8. 关于时局评论的文章。这类文章通过分析时局的特点和本质,预测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党和政府的应对之策。如《斗争》第2期刊登博古的文章《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与国民党投降卖国》就日本对中国侵略进行评述,提出要坚决以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批判了国民党的对日政策。第5期刊登洛甫的《热河的失守与蒋介石的北上》,则评论了热河的失守后的华北局势,号召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这些评论,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了解国内外形势,还可以加深人们对党的政策、路线、方针的理解,从而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

9. 通知、通讯类文章。《斗争》不时刊载一些各地的通讯,诸如“川陕通讯”、“上杭通讯”、“上海通讯”、“陕西通讯”、“宁化县委通讯”、“莫斯科通讯”。这些通讯,通过活生生的实际工作来解读高深的理论问题,体现了《斗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刊原则。它能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成功经验,为苏区革命和斗争提供榜样,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综上所述,《斗争》主要刊载的是马列理论文章、党的文献和党中央领导人撰写的分析形势、指导苏区工作的论文,较之苏区其他报刊其内容偏重政治理论。

#### 四、《斗争》的历史作用

《斗争》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发表了许多对苏区革命和建设有积极作用的文章,对苏区革命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动员、指导和推动作用。

1. 《斗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苏区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第70期《群众创造的历史》一文,对提高苏区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的理论水平,形成党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再第42期刘伯承的《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不仅提出了在游击战争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办法,而且提出了粉碎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堡垒政策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第32期毛泽东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阐明了党的正确的查田政策,指出:对地主采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采取削弱的政策是错误的,这对抵制查田运动的“左”倾土地政策产生了积极作用。《斗争》第42期、第43期、第44期连载的毛泽东《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以及第45期、第46期、第48期连载的《上杭才溪乡苏维埃工作》,在深入苏区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苏区基层政权在苏维埃代表会议、选举、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对苏区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 《斗争》对苏区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苏区扩红运动为例,《斗争》发表了一系列的署名文章,宣传鼓励扩红运动。1933年4月5日出版的《斗争》第7期上,刊登了邓颖超的《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一文,文中提到:要加强扩大红军的速度,采用护拥红军、归队运动、优待红军家属、政治动员等方式去扩大红军。其中政治动员是《斗争》在扩红运动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斗争》刊登了多篇针对不同阶级进行扩红政治动员的文章。特别是在1933年12月至1934年8月,《斗争》几乎每期均刊登了对扩红运动进行政治动员的文章。例如《斗争》第37期刊登的王稼祥的《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而斗争》;《斗争》第38期刊登的李富春的《把扩大红军突击到群众中去》;《斗争》第60期刊登的《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和社论《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斗争》第62期刊登的社论《前进!向着扩红突击的伟大胜利》等等。当时苏区许多党、团支部全体成员加入红军,显然扩红运动这种结果的出现,《斗争》的宣传与鼓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3. 《斗争》在加强苏区党的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斗争》作为党报,发挥了对党内舆论监督的作用。《斗争》第2、3、4期上的《自我批评》,对苏区某些党员干部存在的种种不良作风进行了点名批评,并号召党员干部同这些不良作风进行斗争。第3期杨尚昆的《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对苏区某些党员干部存在的自由主义倾向进行了揭露和剖析,号召大家要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第2期洛甫的《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第63期潘汉年的《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对苏区的官僚作风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旗帜鲜明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工作方式,强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这类文章对苏区党员干部起到了监督、警示作用,有利于加强苏区党的作风建设。《斗争》刊载了大量的马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列主义,这对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加强苏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斗争》刊载的有关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方面的文章,直接指导了根据地党组织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如第5期发表的兴国县黄岑乡党支部《一

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通过介绍兴国县黄岑乡党支部在“支部组织和会议”、“支部组织群众的工作”、“支委会组织”、“支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等方面建设经验,树立了苏区基层党组织进行组织、制度建设的榜样,其示范效应不言自明。

由于《斗争》刊发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在苏区中央局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在宣传“左”倾教条主义理论方面它比其他刊物要更加显著一些,对于革命和苏区社会造成了危害。这主要表现在:

1. 发表了一批宣传“左”倾教条主义理论的文章。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随后向各根据地派出中央代表,全面贯彻其所谓的“国际路线”。《斗争》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成为宣传“左”倾教条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如《斗争》第12期刊登的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提出“要把苏维埃区域连成一片,要解决争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的任务,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斗争》第14期刊登的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提出“必须无情的镇压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收他们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再如1933年10月福建事变发生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央连续在《斗争》发表文章,断定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是更危险的敌人”,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与福建人民政府作斗争。对福建事变作了错误宣传与指导,使红军丧失一次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斗争》通过这些文章,宣传了“左”教条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对革命和苏社会的各项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2. 开展错误的党内路线斗争宣传。《斗争》刊登的关于党内斗争方面的文章有58篇,这些文章的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左”的。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2月23日出版的《斗争》第3期,刊登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和洛甫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断然认定闽粤赣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把“罗明路线”定性为“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号召全党要对罗明路线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斗争》第8期发表张闻天《罗明路线在江西》,文章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有,而且在江西也严重存在,指令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斗争》第12期则发表了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政治报告》,该文提出“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党国际的路线,是一条党的进攻路线”,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在这些文章的鼓动下,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全省迅速铺开。一大批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遭到错误打击和批判。在当时根据地错误的党内路线斗争中,《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马宇平,黄裕冲. 中国的昨天与今天: 1840—1987年国情手册[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 [2]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3)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3] 《斗争》编辑部. 党报启示[J]. 斗争, 1933(2).
- [4] 程 沅. 江西苏区新闻史[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5] 夏道汉, 陈立明. 江西苏区史[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吴 贇)